



夏寶龍對工商界「4點希望」發出的強烈信息

焦點縱論

陳鋒

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昨日在澳門與工商界人士座談交流。夏寶龍主任提出「4點希望」，希望港澳工商界和企業家挺起胸膛堅守國家利益底線，「當受到制裁打壓時，大家應團結起來，展現出應有的風骨和氣節。」「4點希望」發出了強烈的信息，具有高度的指向意義。在當前複雜的國際政經形勢下，企業家只有站在歷史正確一邊、堅定與祖國站在一起，才能經受住風雨洗禮，贏得發展、贏得未來。那些主動向霸權獻「投名狀」的人，不會有好下場，也必為中國人民所不齒。

去年12月，習近平主席親臨澳門，出席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5周年活動並視察澳門，發表一系列重要講話，科學擘畫「一國兩制」事業發展藍圖，為港澳發展領航指向。學習貫徹好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精神，對於各界認清形勢、保持定力、堅決

鬥爭，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在變局中開創港澳發展新局面，具有重要意義。

為國擔當、為國分憂

在昨日的座談會上，夏寶龍主任高度肯定港澳工商界和企業家素有愛國愛港、愛國愛澳光榮傳統，每逢重要關頭都挺身而出為國擔當、為國分憂，留下了濃墨重彩的篇章。不懼怕殖民主義者，不懼怕美西方打壓，勇敢地進行鬥爭，用實際行動詮釋了「商之大者，為國為民」。港澳工商界和企業家在港澳經濟波瀾壯闊的進程中書寫了一個個商業傳奇，始終緊隨中國經濟發展洪流奔湧向前。與國家風雨同舟，克服重重困難，在圍堵中突圍，在壓歷中超越，用行動展現了什麼是「站着抗爭」。

這樣的高度評價，既是回顧過去，也是對未來寄予的期望。正如夏寶龍主任在「4點希望」中所指出，希望工商界和企業家：發揚鬥爭精神，團結一致愛國護港、愛國護澳；堅定發展信心，扎根港澳繼續

做大做强；發揮自身優勢，突出重圍擴大開放、擁抱世界；面向海外講好港澳故事，旗幟鮮明唱響港澳、唱響中國。

這「4點希望」絕非泛泛而論，具有高度的指向性，蘊含了深刻的哲理，充分體現了中央的要求。簡而言之，其核心即在於：鬥爭、信心、優勢、作為。在當前複雜的國際政經環境下，港澳工商界越是落實好這「4點希望」，也就越有助於克服挑戰，在變化中找尋先機、在動盪中保持定力、在考驗中堅定立場，實現自身更大、更長遠的發展。

或許有人會認為，工商界和企業家都是「以賺錢為目的」，無需講究立場。這樣的觀點是大錯特錯的。環顧歷史、縱觀中西，但凡成功的企業家，都是將自身前途與國家民族運緊緊相連的。相反，有的企業或許能憑商業手腕興旺數十載，但如果失去了方向、缺乏應有的國家民族擔當，或在關鍵時刻投向了敵人，「富不過三代」、商業王國一夕之間倒塌也絕非個例。

當前，世界仍然處於動盪當中，霸權霸凌不斷破壞着全球經貿發展。面對霸權行徑，往往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表現。

「下跪」求饒 不會有前途

一種就是軟骨頭，「下跪」求饒。主動獻上「投名狀」的有之，鼓吹「商人純逐利」而不顧國家利益的有之，這樣的人必為包括港澳同胞在內的中國人民所不齒。例如，當霸權覬覦巴拿馬運河港口、意圖通過扼住國際航運「咽喉」以破壞中國發展之際，有的企業想的不是去堅定維護國家重大利益，而是主動配合將戰略資產拱手相讓。其所作所為，無異於資敵、助敵，早已引起輿論的強烈批評。

另一種是硬骨頭，挺身而出堅決鬥爭，展現出中國人的錚錚鐵骨。寧可戴着電子腳鐐也絕不屈服的有之，拿起法律武器奮起反擊的有之，這樣的人是英雄，為包括港澳同胞在內的中國人民所敬仰。例如，在新中國成立之初，莊世平先生不懼港英

當局施壓，毅然升起全香港第一面五星紅旗；抗美援朝時期，霍英東先生組織船隊突破美西方的封鎖，向祖國運送大量急需緊缺的戰略物資。

資本無國界，商人有祖國。「商之大者，為國為民」。對霸權主義本性，絕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哪一個企業的發展不是依託於祖國，沒有祖國的強大，哪來企業的發展；沒有國家的堅強後盾，就沒有企業的根。港澳工商界和企業家作為推動港澳經濟發展的主力軍，立場上要特別清醒、行動上要特別自覺，在風雨洗禮中淬火成鋼。

工商界和企業家和香港其他界別人士一樣，都有着共同的責任和義務。正如夏寶龍主任所指出，當國家利益受損時，大家應挺起胸膛堅守國家利益底線，自覺將自身事業與港澳繁榮、國家發展緊密聯繫起來。那些在關鍵時刻要展現應有的擔當，經受不住考驗投向錯誤一方，注定不會有未來。

深度剖析重大港口出售事件：地緣政治與安全格局的劇變

議事論事

秦漢

2025年3月4日深夜，長江和記實業宣布以228億美元出售全球23個國家的43個港口資產，其中巴拿馬運河兩端的巴爾博亞港和克里斯托瓦爾港最為關鍵。這絕非一場簡單的商業交易，而是在全球地緣政治與地緣安全棋盤上投下的一顆震撼彈，其影響廣泛且深遠，促使我們重新審視國家關鍵戰略資源的掌控和保護。

一、重塑全球地緣政治格局：港口爭奪戰的戰略意義

巴拿馬運河作為全球海運的「咽喉要道」，戰略地位極其重要。根據巴拿馬運河管理局2024年數據，每年通過貨物量達5.2億噸，佔全球海運貿易的6%。其兩端港口巴爾博亞港和克里斯托瓦爾港的易主，本質上是地緣控制權的轉移。美國貝萊德財團通過收購，實際掌握了運河運輸的「閘門」，這帶來多方面的影響。

從軍事角度看，美國海軍藉此提升了在拉美地區的軍事投射能力。依據美國國防部報告，2023年美海軍在加勒比海演習頻次已同比增加37%。這使得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威懾力大幅增強，能夠更方便地對周邊國家施加軍事壓力，鞏固其在西半球的軍事優勢地位。

在經濟影響力方面，美國通過港口定價權間接影響拉美國家經濟。以2022年為例，厄瓜多爾香蕉出口因運河擁堵成本上漲15%，這一數據來自聯合國糧農組織。美國可利用對港口的控制，隨意調整相關費用和運輸規則，使拉美國家在經濟上對其產生更大依賴，進而操控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走向。

對於中國而言，運河控制權的變更成為美國遏制中國的戰略支點。中國海關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與拉美貿易額突破7000億美元，運河控制權的改變削弱了中國對拉美經濟走廊的影響力。中國在拉美地區的貿易往來和經濟合作因美國對運河港口的掌控而面臨更多阻礙，增加了貿易成本和不確定性。

回顧歷史，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中，英法通過控制運河試圖維持殖民霸權，最終因美蘇介入失敗。此次港口出售交易顯示，在21世紀，資本併購已成為地緣博弈的新形態。這種新形態更加隱蔽，卻能達

到與傳統地緣政治手段相同甚至更深遠的影響，通過經濟手段實現政治和戰略目的，值得各國高度警惕。

二、衝擊全球經濟安全體系：壟斷陰影下的供應鏈脆弱性

貝萊德財團收購港口資產後，其控制的港口集裝箱吞吐量達1.14億TEU（20呎標準集裝箱），佔全球10.4%，與馬士基（12.1%）、中遠海運（9.8%）形成三足鼎立格局，這一數據來源於Alphaliner在2025年的統計。這種高度集中的港口控制權給全球經濟安全體系帶來三重風險。

成本傳導壓力日益增大。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24年全球海運成本已佔商品最終價格的18.7%。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模型測算表明，若港口費用提升10%，將導致全球通脹率上升0.6個百分點。這意味着全球消費者將面臨物價上漲的壓力，企業的生產成本也會大幅提高，嚴重影響全球經濟的復甦和發展。

供應鏈斷裂風險加劇。2021年長賜號擱淺導致蘇伊士運河停運6天，全球貿易損失高達每日100億美元。若港口運營方出於政治目的或其他原因人為製造擁堵，全球供應鏈將面臨更嚴重的危機。許多國家的生產企業可能因原材料無法及時供應而停產，零售企業的商品供應也會出現短缺，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對全球經濟造成巨大衝擊。

數字控制權爭奪愈發激烈。貝萊德同步收購港口物聯網系統，掌握全球23%的船舶實時數據，這一數據來自Clarksons Research。船舶實時數據對於航運業至關重要，掌握這些數據就可能形成數據霸權。貝萊德可以利用這些數據進一步鞏固其在港口運營市場的壟斷地位，限制其他航運企業的發展，甚至可能將數據用於政治目的，威脅全球經濟安全。

三、威脅中國經濟安全：多維度的戰略擠壓

對中國而言，此次重大港口出售事件帶來的經濟安全威脅是多維度且極為嚴峻的。

在貿易通道方面，中國商船佔巴拿馬運河貨運量的21%（2024年數據）。若通行費上漲20%，按2023年中國對拉美出口額2350億美元計算，將導致年增成本47億美元。中國船東協會測算顯示，若選擇替

代航線繞道好望角，將使上海至紐約航程增加8000公里，燃油成本上升35%。這無疑將極大地增加中國企業的貿易成本，削弱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競爭力，嚴重影響中國的對外貿易規模和出口企業的生存發展。

能源安全層面也面臨巨大挑戰。國家能源局數據顯示，中國72%的進口石油經印度洋—馬六甲—南海航線運輸，其中18%需通過巴拿馬運河。若運河受阻，按照國際能源署（IEA）標準，中國戰略石油儲備僅能支撐90天，遠低於美國的150天。此外，彭博社數據顯示，液化天然氣（LNG）運輸船通過運河的日均數量從2020年的2.3艘增至2024年的5.1艘，能源運輸對巴拿馬運河的依賴度不斷增加，脆弱性也隨之加劇。一旦運河運輸出現問題，中國的能源供應將受到嚴重影響，進而威脅到國內工業生產、民生保障等各個領域。

從「一帶一路」戰略推進來看，商務部數據表明中資在拉美港口投資超240億美元，但巴拿馬運河兩端港口的失控可能引發「多米諾效應」。摩根士丹利預測，秘魯錢凱港（中資控股）的貨物中轉量可能被分流30%。這將阻礙中國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與互聯互通，損害中國與沿線國家的共同利益，影響「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速度和成效。

四、國家關鍵戰略資源的再定義與數據支撐

國家關鍵戰略資源是指對國家生存、發展和安全起決定性支撐作用的各類資源，具有不可或缺性、戰略性和稀缺性等特點。

在能源方面，中國石油對外依存度達73%，天然氣對外依存度為45%，對外部能源供應的依賴程度極高。能源是現代工業和社會運轉的動力源泉，如此高的對外依存度使中國在國際能源市場上面臨諸多風險，如價格波動、供應中斷等。

稀土資源方面，中國供應全球90%的重稀土，60%的輕稀土，在全球稀土市場佔據絕對控制地位。稀土被稱為「工業維生素」，廣泛應用於電子、新能源、航空航天等高端產業，是現代高科技產業發展的重要支撐。

數據資源成為新的關鍵戰略資源。IDC數據顯示，中國跨境數據流規模達每年

16.6ZB，目前對國際通道存在中度依賴。在數字時代，數據蘊含着巨大的經濟和社會價值，是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等新興技術發展的基礎，數據資源的掌控對於國家的數字經濟發展和信息安全至關重要。

港口資源上，全球前50大港口中中國運營28個，區域控制力較強。港口作為連接國內外貿易的重要節點，承擔着貨物運輸和物流集散的重任，對國家的貿易和經濟安全有着重要意義。

隨着科技的發展，人工智能訓練需消耗巨量戰略資源。例如，根據史丹福大學AI指數報告，訓練GPT-5消耗的電力相當於50萬家庭年用電量，這凸顯了算力資源在新時代的戰略地位。算力已成為與能源、數據等同等重要的戰略資源，對於國家的科技競爭力和未來發展起着關鍵作用。

五、掌控戰略資源的創新策略：技術與制度雙突破

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和日益嚴峻的戰略資源挑戰，中國需要採取創新策略，從技術和制度兩個層面實現突破。

在智能監管革命方面，建立「戰略資源數字孿生平台」，接入全球8500個關鍵節點實時數據，包括港口、礦山、輸油管等。利用人工智能技術預測風險，如在2024年通過該平台提前7天預警紅海航運危機，減少損失12億美元。這一平台能夠實時監控戰略資源的動態，及時發現潛在風險並採取應對措施，大大提高了戰略資源監管的效率和準確性。

在替代網絡構建上，積極開發北極航道，2024年通航期已達75天，運輸成本比蘇伊士航線低25%，這一數據來自俄羅斯北極物流局。北極航道的開發為中國提供了一條新的貿易運輸通道，降低了對傳統航道的依賴，增強了貿易運輸的安全性和靈活性。同時，中歐陸海快線2025年貨運量突破80萬TEU，時效比海運快12天，中國鐵路總公司的數據顯示出這條線路在提升運輸效率方面的優勢，有助於中國拓展與歐州的貿易合作。

規則重構行動也至關重要。推動金磚國家建立「戰略資源應急協調機制」，設立500億美元聯合儲備基金，這是2024年金磚峰會的提案。通過這一機制，金磚國家可以在戰略資源領域加強合作，共同應

對資源供應危機和價格波動。此外，在WTO框架下發起「關鍵基礎設施非軍事化」倡議，參考《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87條，限制港口等設施的軍事化使用，維護國際公平公正的貿易和運輸環境。

在技術卡脖子突破上，中國在稀土提純技術方面已實現0.1ppm超高純稀土量產，打破美日0.5ppm的技術壁壘，這一成果來自包頭稀土研究院。在能源區塊鏈領域，國家電網搭建的「綠鏈」平台使新能源交易效率提升40倍，這是2024年全球區塊鏈峰會的案例。這些技術突破有助於中國在關鍵戰略資源領域掌握更多主動權，減少對國外技術的依賴。

六、歷史經驗與未來預判

歷史經驗往往能為我們提供重要的借鑒。2016年希臘比雷埃夫斯港被中遠收購後，歐盟緊急出台《外國直接投資審查機制》。此次重大港口出售事件影響巨大，或將催生新版「全球戰略資產保護協定」。這表明在全球範圍內，各國對於關鍵戰略資源的保護意識不斷增強，未來可能會出現更多的國際規則和協定來規範戰略資源的交易和控制。

從未來趨勢推演，麥肯錫預測到2030年，全球70%的關鍵港口將被三大資本集團控制。面對這一趨勢，中國需在2027年前完成「三縱三橫」自主港口網絡布局，即渤海灣—南海、印度洋—紅海、北極—波羅的海。通過構建自主港口網絡，中國能夠增強在全球海運貿易中的話語權和控制力，降低因外部港口控制權變化帶來的風險。

結論：從被動防禦到主動塑造

此次重大港口出售事件標誌着地緣博弈進入「資本化控制」新階段。中國不能再處於被動防禦的地位，而應構建「三位一體」防禦體系。在物理層，通過北極航道、中歐班列等新通道對沖海運風險，拓展貿易運輸的多樣性；在數字層，建立自主可控的全球物流數據鏈，掌握數據主動權，保障信息安全；在規則層，積極推動國際資源治理體系改革，參與國際規則制定，維護國家戰略資源權益。唯有將戰略資源掌控能力嵌入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從多方面提升戰略資源掌控能力，方能在百年變局中築牢安全底線，實現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和長治久安。

中美達成共識為全球經濟紓壓增信

議論風生

陳劍

當地時間5月12日上午，中美在瑞士日內瓦舉行中美經貿高層會談結束後，雙方發布《中美日內瓦經貿會談聯合聲明》。根據聯合聲明，美國承諾暫停實施24%的從價關稅90天，只保留10%的稅率；中國則同步調整對美商品的關稅，並取消非關稅反制措施。這意味着，美方90天內僅保留加徵10%的關稅，期滿之後則保留34%的關稅。中美達成共識，對於穩定全球經貿具有重要意義，對中美兩國都是重大利好。事實也再次證明，中美「合則兩利，鬥則兩傷」，唯有加強協商才是解決問題的有效方式。

為後續合作奠定基礎

這一輪中美經貿摩擦，由於美方對華加徵畸高關稅，中方為維護自己利益進行堅決反制，雙方在很短時間就把關稅拉到

近乎停擺的狀況。這在全球化時代下，顯得格外罕見。在這樣情形下，中美經貿高層在瑞士的會談取得了實質性進展，不僅符合中美兩國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全球期待。

此輪會談主要成果，首先是恢復中美貿易，在此基礎上，拉長合作清單，做大合作蛋糕，就更多的問題進行探討。包括中美在製造業、新興技術領域等方面的合作。這就需要建立具有持久意義的經貿磋商機制。

日內瓦談判不是終點而是一個起點。後續中美還會持續進行談判，90天之後的關稅有望從34%降至20%甚至更低。

不同於其他國家與美國談判往往需前往華盛頓，中美將談判地點定在第三國，這一安排充分彰顯了中美關係的平等屬性，也有力印證了中方始終堅持的談判原則——即必須在相互尊重、平等協商、互惠互利

的基礎上推進對話與合作，拒絕任何不平等、脅迫性的談判模式。

中美會談後形成的會談成果，超出全球市場預料，符合筆者預期。此次會談成果之所以被評價為「超預期」，並非簡單的關稅數字減法，而在於它從直接對抗轉化為通過平等對話協商解決分歧的重要一步，為後續合作奠定基礎。

接下來90天的履約節奏，若能在規則透明、監測可信的軌道上持續推進，中美經貿關係將可能進入「分歧緩和、競爭有序」的新常態。

此次會談能取得實質性進展，主要基於以下三個原因：

一是中美雙方都不希望脫鈎。這一點十分重要。正如我們所知，雙方重建溝通管道，這本身就是一項巨大的挑戰。既然都不希望脫鈎，雙方都屬於主動方。也正因為此，雙方能夠以務實的態度對話，並重新建立

起合作的基礎。這就可以解釋，整個協議在幾天內就能達成，並迅快形成共識。

二是中美之間擁有廣泛的共同利益和廣闊的合作空間，而且中美兩國經貿關係的本質是互利共贏。中美自1979年建交以來46年交往，中美之間的合作交往極大促進中國現代化進程，推動了美國經濟持續發展。作為發展階段、經濟制度不同的兩個大國，中美雙方在經貿合作中出現分歧和摩擦是正常的，關鍵要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原則，通過平等對話協商，找到妥善解決問題的辦法。

平等協商妥善解決問題

三是中方應對得當。美國啟動「對等」關稅後，中國是「以牙還牙」，是第一個反制「對等」關稅的國家。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這次的溝通結果，正是在前期鬥爭的基礎上，雙方相向而行得來的。

此次中美經貿對話，通過溝通，加深了理解。例如芬太尼問題，通過面對面交流，雙方也都第一次真正理解各自採取的行動，並提出了下一步如何加深合作。

美國將日益擴大的貿易逆差視為所謂的「不對等貿易關係」造成。但事實上，其貿易逆差與自身經濟失衡密切相關。如果雙方能夠坦誠溝通，實行更加開放的政策，推動更加公平的貿易關係，那麼中美之間可以實現「共同的再平衡」。

此次會談達成共識，是中美經貿關係的一個積極動向，為後續溝通與談判奠定了基礎。但也要看到，「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美之間結構性矛盾和深層次分歧依然存在，解決這些問題不可能一蹴而就。關鍵在於，雙方要相向而行，在相互尊重、平等協商、互惠互利基礎上推進對話與合作。

中國經濟體制研究會特約研究員